

ChuanTong
Yu
XianDaiXing
De
ShuXiang

传统与现代性的殊相

——人类学视阈下的西北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

杨文炯 著

民族出版社

传统与现代性的殊相

——人类学视阈下的西北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

杨文炯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与现代性的殊相：人类学视阈下的西北少数民族
历史与文化/杨文炯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4
(西北民族学院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文库)

ISBN 7-105-05027-6

I. 传... II. 杨...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历史—
研究—西北地区②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西北地
区 IV. K2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4531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6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2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序

杨建新*

文炯同志的《传统与现代性的殊相》一书，涉及到了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与传统和现实中的西部大开发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的少数民族的社区与文化变迁。内容虽然十分宽泛，却贯穿着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从各个方面来阐述西北少数民族在发展中，特别是在当前，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学研究中，无疑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对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学术界有过许多讨论，对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有许多讨论和看法，就总体来说，这个问题是清楚的，但并未完全解决，还有可讨论之处。甚至对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化，也还有不够清楚的方面。

每一个民族都有由本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积累下来，并一直保持到今天的一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我认为这就是传统，也可以称之为传统文化。同时还应看到，每一个民族由于历史发展不同，自然生态环境不同，民族关系环境不同，因此传统文化也各不相同，或有一定差异。这种不同和差异在一定意义上说，实际上就形成了每个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甚至成为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外在的，即能够表现在现实生活的各方面；

* 杨建新，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另一种是内在的，即表现在意识中，特别是凝聚为民族意识，民族的自我认同，这种形式的传统就更牢固得多。传统或传统文化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部分，是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而特有的标志之一。

对现代化有许多理解，我认为，现代化应该有一定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指标，但现代化不应该仅仅是一种经济、技术指标和社会指标，更不应理解为一体化、国际化和西化。具体到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它主要应该是指一个民族适应社会发展，适应国际竞争，自立于现代社会，以及能容纳现代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能力和胸襟。也包括在吸纳先进文化的同时，将自己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保留、发扬、并使其提升的能力和胸襟。特别是在本民族知识阶层中表现出的提升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更是一个民族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所谓矛盾的一面，就是任何传统文化，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都是这个民族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中、在共同生活积累中形成的。而任何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条件，不可能长期不变，特别是在当前，整个人类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社会生活环境不断变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迅速更新的情况下，传统必然受到严重的冲击，一部分不适应现代的传统还将遭到改变和淘汰，这种情况也可以叫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处理得好，这种矛盾会成为推动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有统一的方面，那就是，任何一个民族，她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原有的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基础，也就是说，现代化的各个方面，都只能建立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之上，而且即就是一个民族外在表现的传统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内在的传统文化即民族意识、民族认同依然会成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引导

一个民族现代化趋势、走向、特点的内在因素。因此，从根本上说来，一个民族的传统和民族的现代化是能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是统一的。

对于传统，人们总认为它应该是不变的。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回顾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到其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习俗等变动的痕迹，而且这种变动的速度是愈来愈快，愈来愈大。这种变动，实际上是在这个民族对生活质量要求日益提高的推动下，不知不觉而又是不避免的实现的。当然，这种变化也肯定会引起痛苦、不满甚至反抗，但是，这种变动的趋势并不会因此而逆转。

作为一个民族学研究者，我想我们必须尊重各民族的传统文
化，认识其产生、发展、变化的状况，同时要研究促进民族现代化，促进其传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改变和发展，研究如何使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如何既保存传统又能进入现代社会等问题。

文炯同志的这部书就是站在现代的角度，研究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如何结合，用什么方式结合，在什么层次上结合这个大问题的。我认为书中很多提法、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对正确认识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结合的途径，是很有帮助的。

作者简介

杨文炯，1967年生，回族，宁夏灵武市人。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现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师从杨建新教授），西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讲师。主要从事以西北少数民族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近几年在《回族研究》、《兰州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北史地》、《西藏研究》等国内公开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目 录

第一编 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西北少数民族文化 ·····	(1)
一、中国文化体系与多元一体格局·····	(1)
(一) 文化与文化的基本特征 ·····	(1)
(二) 文化地理学视界下的中国文化体系 ·····	(6)
(三) 多元一体结构: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写真 ·····	(8)
二、多元一体格局中的西北少数民族文化·····	(27)
(一) 西北区域与西北区域文化 ·····	(27)
(二) 源远流长的西北区域文化 ·····	(30)
(三) 历史上西北少数民族的政治活动及其影响 ·····	(38)
第二编 西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及其现代化思考 ·····	(43)
一、宗教: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43)
二、我国少数民族宗教的特点·····	(47)
三、西北少数民族宗教分类概述·····	(51)
(一) 原始宗教 ·····	(51)
(二) 高级宗教 ·····	(59)
四、宗教与西北少数民族的现代化·····	(82)
(一) 宗教:少数民族文化的实质性传统 ·····	(83)
(二) 少数民族文化的实质性传统并非与现代化对立 ·····	(85)
(三) 实质性传统的自觉转型是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 的关键 ·····	(87)
五、历史镜鉴:宗教与社会的艰难调适——达玛灭佛与 唐武宗灭佛的比较研究·····	(89)

(一) 经济原因	(91)
(二) 政治原因	(94)
(三) 文化冲突的原因	(102)
第三编 现代化视界下的西部大开发	(108)
一、西部大开发：一种另类现代性的探讨	(108)
二、人力资本战略：西部大开发的必由之路	(125)
(一) 资源优势战略：主体视界下的再审视	(126)
(二) 人力资本战略：知识经济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必由之路	(131)
三、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以临夏模式与回族传统为例	(142)
(一) 临夏模式与回族传统	(144)
(二) 神圣的“天职”观与重商的伦理精神	(149)
(三) 因地制宜，不同模式	(157)
四、知识分子：传统与现代性的重要媒介——文化自觉与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的转型：以虎嵩山为例	(158)
(一) 家庭传统的“叛逆”，投身于伊赫瓦尼清教运动	(162)
(二) 改革传统的经堂教育，兴办现代回民学校	(167)
(三) 反对抱残守旧，提倡与时俱进的精神	(170)
(四) “国家兴亡，穆民有责”的爱国精神	(172)
第四编 西北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研究（上）	
——以兰州市回族穆斯林社区研究为个案	(178)
一、关于城市回族穆斯林社区的研究现状与方法	(179)
(一) 关于城市回族穆斯林社区的研究现状	(179)
(二) 关于城市回族穆斯林社区的研究方法	(181)
二、Jamaat：城市中的亚社会与族群文化	(183)
(一) Jamaat：文化主体自我定义的社区概念	(183)
(二) Jamaat：一种亚社会与文化范式	(185)

(三) Jamaat: 作为一种族群意识与族群边界	(203)
(四) Jamaat 与城市中的他类社区: 罗织与关联中的 自在	(213)
三、Jamaat 地缘变迁及其文化影响	(216)
(一) 社区地缘变迁: 城市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现象	(217)
(二) Jamaat 的地缘结构: 时空坐落格局	(220)
(三) 引发 Jamaat 地缘变迁的诸因素分析	(246)
(四) Jamaat 地缘变迁势向和可能产生的文化影响	(255)
第五编 西北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研究 (下)	
——以兰州市回族穆斯林族群社区为个案	(259)
四、Jamaat 的社缘变迁研究	(259)
(一) 社区社缘变迁的界定与西方城市社会学的观点	(259)
(二) 大文本传统的变迁与回族穆斯林社区的重建与 整合	(261)
(三) 女学: 经堂教育的拓展与文化传承角色重心的位 移——以兰州市、西安市、临夏市调查为个案	(275)
(四) 文化自觉与精神渴望——《开拓》一种文化现象	(290)
(五) 家庭知识资源贫困的代际传承与文化不适 ——兰州市回族学校回族学生低升学率原因的调 查与分析	(303)
五、城市界面下的回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320)
参考书目	(325)
后记	(332)

第一编 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 西北少数民族文化

一、中国文化体系与多元一体格局

(一) 文化与文化的基本特征

文化几乎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关键词,然而文化又是一个争议最多,歧义丛生的概念,不同的人文学科对文化有不同的定义。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文化”一词是近代学人从西方 culture 译介而来的,并借用汉语中固有的“文”、“化”、“文化”等词融生而成的。“文”与“化”最早见于《易辞》中的《象传》:“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以降,“文化”连用并成为专用名词。如西汉刘向的《说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南齐王融的《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晋人束广微的《补亡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文化”意指文治教化,属精神文化的狭义范畴。英文的 Culture 源于拉丁文 Cultura,其原形是动词,有“耕耘”、“居住”等含义,显而易见,“文化”与农耕经济有着渊源关系。后来英文中的 Culture 逐步由“耕种”引申为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教化。显而易见,东西方相比较,基于人的类本质之上的东方的“文化”与西方的 Culture 之涵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从“文化”的本义上升到学科意义上的“文化”却因不

同分支的人文学科而众说纷纭。我国学术界常用的“文化”的定义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采用三分法: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在文化人类学界,英国学者泰勒的文化概念影响较大,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① 美国人类学家 A. L. Kroeber 和 Clyde Kluckhohn 的文化定义是:“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的物品的各种具体样式,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② 我国学者杨庭硕教授从民族学的视角给文化的定义在笔者看来更为全面一些,他说:“文化是人类为维系各个具体的社会集团(这里指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经由该集团所有成员在其时代延续中已渐次积累和约定俗成的方式建立起来,并有后天习得而加以延续与丰富的一个相对稳定而又独立完整的社会规范总和。”^③ 据有关学者统计,关于文化的定义不下 150 余种,可见其争议之多。事实上,正如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一样,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象征、表述和展示,不同人文学科立足庐山内外,面对文化的横峰侧岭,学术上的各抒己见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人是分娩于自然环境之中的社会之子,文化是复数的人达成的社会契约,是人与自然、社会联结的脐带。因此,从社会的视角看,文化是人之社会生活设计的历史遗传,

① 泰勒:《原始文化》第 6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转引自宋蜀华主编:《中国民族概论》第 141 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杨庭硕:《相际经营原理》第 106 页,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

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它作为一整套符号的象征系统，是社会成员互动的游戏规则——一种行为模式。从自然的视角看，文化是人化的自然，是维持人之社会与自然生态平衡的产物，是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平衡的调节器。从社会与自然的双重视角看，文化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样式，是人之为人的自我确证，是人的类本质的反映。所以，文化作为人在社会与自然的双重互动的规约中的创造物具有五大特征：

1. 文化的通约性

文化的通约性又称为文化公分母、文化常数、文化的普同性，是指人类的各种文化中普存的共通性的文化因素。在人的类本质上，人具有心性的一致性，其文化的创造必然有其共通性。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公分母，才有了跨民族的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交流和借鉴。在人类历史上，在文化通约性的基质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学习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的“世界上富有成效的交换是最自然的事情。与世隔绝的文化必定会停滞不前，历史的坟场上就遍布着这样的僵尸。伟大的文化总是从其他文化中学习思想观念，并受到这些思想的激励。同时，他们也惊奇地注视着他们的思想观念被其他文化所借鉴，并在其他文化中开始产生出新的生命”^①。

2. 文化的传统性

一种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乃是因为其有自身的传统，传统是文化的根，民族的魂，它产生于民族的长期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积淀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内部的指令，凝结成为民族精神。亦如社会学家 E 希尔斯指出的“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

^① 西里尔·E 布莱克编，杨豫译：《比较现代化》第 35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

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①。又如我国学者庞朴所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②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传统正是这样的源头，亦如我们在历史的场景中所看到的，许多民族在走到十字路口时，总是在正本清源，返本开新中获得新的启示和精神动力，从东施效颦的迷困中找到符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表明现代化的陷阱原本不是传统，而是对传统的蔑视。总之，传统是文明的积淀，文明的积累，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本金，是现代化的先期投资。

3. 文化的时代性

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一个动态的河系。它一方面阶段性地展现一个时代的横截面，另一方面它又必然伴随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深入而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进步，它总是不断地从自在的文化迈向自觉的文化。一个滞后于时代的文化必然陷入文明的被动境地，因为文化滞后（*cultura lag*）往往在潜移默化中滋生文化主体不能自觉的文化蒙蔽（*cultura blindness*），最终导致文化萎缩（*deculturation*）。然而面向时代的文化创新和返本开新的文化再解读又是文明重新开启和焕发生命力的必由之路。

4. 文化的民族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民族构成了人类社会“群分”的基本单元。不同的文化总是不同民族所创造的智慧结晶，文化因此也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的印记，成为不同民族间借以区别的符号标界和同一民族内部相互认同的符号。正如人类学家怀特所说：

① E·西尔斯：《论传统》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庞朴：《一分为三》第327页，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

“人们的行为差异取决于文化而不取决于人的生物因素。因此，在考虑各民族的行为差异时，我们可把生物学因素看成是一个常数而不予考虑。这样我们可以重写关于人的行为差异的公式： $C \rightarrow B$ ，文化产生或决定行为，个人行为取决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或 $B = F(C)$ ：行为是文化的函数。各民族的行为差异是各文化差异的函数。”^①

5. 文化的地域性

“天地间最高的典型，只属于人”。人是万物之灵，是造物主的杰作，然而人又是造物主在造就了万物之后的作品。因此，自然先于人而存在，地理环境构成了人类文化创造的前在的自然基础。人正是从一个自然之子走向了社会之子——人化自然，成为文化之子。人类无法脱离自然界而创造文化，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② 所以，地理环境是人类创造文化的自然之基。同时，特定的自然环境又规定着人们的生计方式和与此地理环境、生计方式相适应的文化样式。亦如列宁所言：“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有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③ 概言之，人类文化的创造必然印上不同地理环境的胎记。如我国古籍所载：“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

① 怀特：《文化科学》第18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59页。

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① 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的族群必然适应自身的生存环境而展示其生存智慧，创造出一种生产方式，生成一种文化模式。文化不仅是人之社会的契约，而且是人与自然的契约，这个契约又必然打上特定地域环境的胎记。

以上文化的五大特征是标识一种文明或文化体系的基本参数，也是我们解读中国文化体系及其结构的基本参数。

（二）文化地理学视界下的中国文化体系

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即研究人类文化的活动地域系统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如美国学者乔丹（T·G·Jordan）所认为的“文化地理学就是研究文化集团空间变化和社会空间机能”^②。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是，在人类活动的地域中，文化是人地关系的具体形态，人一文化系统—地域环境共同构成地域文化系统，在人地关系中，“人”处于主动地位，是主体；“地”作为客体则处于被动地位。地域文化系统的结构就是人类活动、文化系统和地域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构体系，在此结构体系中产生出文化力量和文化结构的发展动力。因此，文化因素是形成地域文化系统特性的关键因素——“一个区域要和它的四周区别开来，除了需用突出的山水、语言、或技艺外，还必须有一种基于某种宗教教义、社会观点、政治模式的强烈信仰，有时二者是结合的”^③。同时，这些张扬地域文化个性的文化因素又往往呈现为独特的文化景观——“文化景观是文化集团在其居住的地域上所创造的人为景观。文化采用自然所提供的材料塑造了

① 《礼记·王制》。

② 乔丹等著，王恩涌译：《文化地理学》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张文奎主编：《人文地理学概论》第341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他们自己的景观。每个有人居住的地区都有文化景观……并且每个文化景观都独特地反映出创造它的文化。景观是文化的一面镜子”^①。所以，同一文化景观之下，往往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交往的地区，文化因素在地区的分布和组合上有机地自成体系或模式。由此文化景观成为学术上划分文化区的一个常用的参数，即根据生产方式、语言、宗教、政治形态、日常生活、房屋构造、风俗以及对自然适应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差别来划分文化区。诚如美国学者肯达尔所说的：“文化区是一组相类似的、内部又相互联系的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区域，这些文化通常具有许多共同因素，特别是语言和宗教。”^②因而，文化地理学家们据此将世界划分为几个大的文化区域或文化圈：

萨帕（K. Saper）根据人类民族文化的影响将世界文化划分为日耳曼文化区、拉丁文化区、斯拉夫文化区、西亚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东亚文化区、内陆文化区、非洲文化区、马来文化区、澳大利亚文化区和北极文化区。^③

青野首男等人将世界文化划分为六个文化圈：东亚文化圈、马来文化圈、南亚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非洲文化圈和欧洲文化圈（其中又包括日耳曼文化、拉丁文化、斯拉夫文化三个亚圈）。^④

肯达尔将世界文化划分为六个文化区：东亚文化区、西方文

① 乔丹等著，王恩涌译：《文化地理学》第2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 肯达尔著，李根良译：《现代文化区》见《国外人文地理》1986年创刊号第83页。

③ 张文奎主编：《人文地理学概论》第347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张文奎主编：《人文地理学概论》第348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